

满人封疆大吏崧蕃与庚子西巡前后的陕甘政情

韩策

(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 北京 100871)

摘要: 庚子西巡中西安成为“陪都”地位顿时凸显,陕甘总督和陕西巡抚因之更加重要。研究表明,庚子年陕甘总督由湘军大将魏光燾突然过渡到满人崧蕃的内情和影响颇不寻常。这既与魏光燾勤王不力不无关系,也是慈禧太后彼时更信任旗人的鲜明体现,还与复杂敏感的董福祥善后问题密切相关。与庚子年“惩处”董福祥问题已经较为清楚不同,辛丑回銮过程中的二次“惩董”问题尚扑朔迷离。崧蕃与曾经的西北大员、现任军机大臣荣禄和鹿传霖主张用怀柔之法,而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督抚力主处死董福祥,各方都有过刀光剑影的秘密运作。庚子西巡期间陕甘总督的人事变动和董福祥问题的处理结果,预示着湘系式微、满回增强的权势转移和政情变化,正在陕甘地区悄然发生。

关键词: 庚子事变; 陕甘总督; 慈禧太后; 董福祥; 荣禄; 袁世凯

中图分类号: K 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21)01-0127-09

满人崧蕃,自光绪十七年(1891)开始,在西南和西北任封疆大吏长达十五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晚清大员。^①特别是在庚子西巡的乱局中,当两宫驻蹕西安不久,崧蕃就奉命接替湘军大将魏光燾出任陕甘总督,坐镇甘肃兰州,保护行在后路,地位尤为重要。事实证明,这次人事调整的内情和影响颇不寻常。一方面,它与董福祥甘军的善后问题实有密切关系;另一方面,它打破了自左宗棠西征以来三十多年间,主要由湘系要角总督陕甘的“惯例”。^②此后直至清朝覆亡的十年中,陕甘总督均系旗人(崧蕃、升允和长庚)。由此而言,庚子乱局中陕甘总督的人事变动,对西北地区军政力量调整和满汉关系变化都有特殊意义。本文先讨论崧蕃何以能在庚子年陕甘总督人事变动中脱颖而出,进而考察他在处理董福祥善后问题上与清廷高层的暗中互动及扮演的特殊角色,用以管窥庚子西巡前后的陕甘政情。^③

一、崧蕃的家世和仕履

崧蕃(1837—1905),字锡侯,瓜尔佳氏,满洲镶蓝旗庆保佐领下人^④,出身科举仕宦家庭。其父忠廉,字鹤皋,嘉庆己卯科(1819)举人,曾官两淮盐运使。其兄崧骏,字镇青,咸丰戊午科(1858)举人,官

收稿日期:2020-07-20

作者简介:韩策,男,陕西蓝田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

① 崧蕃其人的研究甚少,苏豪东的《崧蕃治理西南、西北边疆研究》(兰州大学硕士论文,2018年)有所勾勒。

② 这一现象甚为明显。关于清季西北督抚的大体情形和清代陕甘总督的人事情况,可参看张理想的《清季西北督抚研究》(兰州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和杨海燕的《常与变:陕甘总督群体构成与人事嬗递探赜》(温州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

③ 庚子事变中惩处董福祥问题至少集中发生过两次。第一次在庚子年冬惩办“祸首”之时,已经研究得较为清楚;第二次在辛丑年冬回銮过程中,仍有探讨余地。本文的讨论即侧重在后者。一般研究庚子事变或义和团运动的论著都会涉及庚子年的“惩董”问题,薛正昌的《董福祥传》(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0—294页)所述尤详,但其对辛丑年的“惩董”问题,实有误解。关于第一次“惩董”相关问题的近期研究,见戴海斌《辛丑条约议定过程中的一个关节问题——从“惩董”交涉看清政府内部多种力量的互动》,《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马忠文《荣禄与晚清政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99—308页。

④ 秦国经主编《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4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33页。据履历,崧蕃在1885年为49岁,故推算其生年大约是1837年。又,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初七日(1906年1月1日),崧蕃奉旨赐恤,则其卒于稍前。

至浙江巡抚。据说,当咸丰季年,忠廉因与肃顺抵牾,为所中伤而下狱,久之乃得昭雪释放。而崧骏、崧蕃兄弟“勤苦砥砺,卒自树立”终至同任封疆大吏,“皆以廉谨称”。^①辛酉政变后,凡受过肃顺一派“打压”的官员,大多迎来转机。崧骏、崧蕃兄弟后来仕途顺遂,或许与此不无关系。当日恭亲王奕訢阵营中的军机大臣文祥,就很器重崧蕃。^②另据李鸿章说,崧蕃兄弟皆是军机大臣李鸿藻“受业门人,故两人升迁甚速”。^③而军机大臣荣禄后来亲口承认崧蕃是其亲戚。^④饶有意味的是,李鸿藻与荣禄关系亲近。^⑤可见,崧蕃兄弟的高层人脉甚为深厚。当然,人脉之外,其科名和历练亦值得重视。

崧骏考中举人之时年方二十六岁,绝不算晚,而乃弟崧蕃年仅十九岁就由廪生中式咸丰乙卯科(1855)举人,可谓科名早达。^⑥尽管二人均未考中进士,但举人功名在旗人中不仅颇为难得,而且仕途够用。比崧骏、崧蕃晚一辈的显宦那桐和端方,在晚清号称满洲才子,就都是举人出身。从崧骏、崧蕃兄弟的仕履观察,他们走的是由京官部郎外放道府,进而陈臬开藩,游登封圻的“正常”道路,与晚清军功起家而任封疆大吏者颇为不同。同时,崧蕃的仕途相当顺遂,历练也比较完整。京官十五年,历充吏部文选、稽勋、验封、考功各司掌印,熟悉吏部业务。外放后,先后担任盐茶道、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二十余年,吏治、司法经验均甚丰富,尤擅筹饷。如果一定要挑“不足”,那么,崧蕃出京后主要在四川、云贵等西南省份任职,缺乏东南和西北地区的做官经历。^⑦

不过,当庚子事变前夕,在做过督抚的满人大员里,除了军机大臣荣禄和刚毅外,直隶总督裕禄的资格最深,其次便当属云贵总督崧蕃和四川总督奎俊。^⑧只是庚子年七月、闰八月,裕禄和刚毅先后亡故,崧蕃遂成满人疆吏中最有资历者。当然,下文将看到,最有资历并不足以解释崧蕃何以成为庚子乱局中陕甘总督的人选。

二、从魏光焘到崧蕃:庚子年陕甘总督变动内情

在庚子、辛丑之际的政局中,西北内陆的陕西和甘肃地位格外凸显,陕甘总督和陕西巡抚的位置特别关键。这不仅因为,庚子年两宫幸陕,西安可谓陪都,甘肃则为后路屏藩;而且因为,护驾两宫、拱卫行在的军队绝大多数都是甘军,从董福祥到岑春煊,从邓增到马安良,其麾下军队莫不如此。所以,对陕甘

① 徐世昌著、傅卜棠编校《晚晴诗话》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24、1131页。

② 《松锡侯廉访五十寿序》,梁小进主编《郭嵩焘全集》第14册,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419页。

③ 《李鸿章致刘秉璋函》(光绪十五年五月十六日),刘声木编录、刘园生点注《李文忠公尺牍》,载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21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30页。

④ 《欧阳熙致李盛铎函》(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十三日),邓之诚著、栾保群校点《骨董琐记全编》下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30页。

⑤ 祁景颐《谿谷亭随笔》,《青鹤笔记九种》,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61页;马忠文《荣禄与晚清政局》,第68—75页。

⑥ 秦国经主编《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4册,第26、333页。

⑦ 崧蕃于同治四年(1865)捐纳吏部员外郎,候补六年之后,补授吏部验封司员外郎,后兼摄内务府银库员外郎。光绪二年(1876),升吏部考功司郎中,历掌文选、稽勋、验封、考功四司印钥,属于有实权的司官。光绪五年(1879)六月,以京察一等记名,简放四川盐茶道。此后数次署理四川按察使。光绪十一年(1885)六月十七日,擢湖南按察使,次年再升四川布政使。光绪十七年(1891)升授贵州巡抚,成为封疆大吏。随后历任云南巡抚和云贵总督。庚子事变中,崧蕃调任陕甘总督。光绪三十一年(1905)调闽浙总督,未就任而卒。参见秦国经主编《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4册,第333—334页;第5册,第279—280页。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31、1734、1494、1496—1497页。

⑧ 1896年裕禄五十六岁,但已任疆臣二十多年,故王文韶叹其“早达”。袁英光、胡逢祥整理《王文韶日记》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25页。又,在庚子年正月的京察名单里,崧蕃和直隶总督裕禄、湖广总督张之洞、四川总督奎俊并列在议叙之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6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页。

总督而言,战时筹饷备械、保境安民固然不易,迨局势稳定后,裁并军队和确保善后亦属为难;对慈禧太后和清廷高层来说,陕甘总督和陕西巡抚的人选也就比往常重要敏感得多。^①

本来,因为左宗棠率领湘军平定西北的缘故,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由湘系元老或随湘军建功者出任陕甘总督的“惯例”已经延续了三十多年。左宗棠、谭钟麟、杨昌濬、陶模皆其显例。在庚子事变之前,陶模奉命进京陛见,由湘军大将、陕西巡抚魏光焘署理陕甘总督。倘若时局稳定,陕甘地区的人事变更自然会平淡许多,但庚子西巡彻底改变了形势。

庚子年七月,八国联军兵临城下,慈禧太后偕光绪皇帝仓促出京。七月二十九日,两宫在直隶宣化寄谕署理陕西巡抚端方,称“暂行巡幸太原,本非久计。长安为自古帝王州,山川四塞,雄据上游”,故令端方预备西安行宫和沿途踈路供应。^②这表明西安很可能是西巡的最终目的地。但是,当时情形并不明朗,恐怕慈禧太后也未必下定决心要到西安。八月初六日,魏光焘和端方联衔上奏西巡事宜,词意游移两可,有云“伏望圣慈独断,早定大局。如决裂不至太甚,款议可以速成,则此时驻蹕太原,将来回銮较近。万一彼族要挟过甚,不免旷日相持,则燕晋毗连,犹恐震惊法驾,拟即吁请乘舆渐行渐远,移幸西安。虽行宫工大难成,而圣明慈俭为怀,关内臣民莫不延颈企踵,日望六飞之至。总之,和局定则以还京为上策,可以安宗社之灵;和议缓则以关中为退步,亦不受彼族之制。”八月十二日奉旨“览”。^③十七日,两宫抵达太原。在此前后,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和奕劻,东南督抚刘坤一等,驻外公使杨儒及其他官员,纷纷上奏,或主回銮,或主西进,各有道理,莫衷一是。^④

显然,两宫是否暂驻太原,抑或继续西进,还是尽快回銮,已经成为朝野中外关注的焦点。正在这时,率兵勤王的江苏巡抚鹿传霖赶至行在,成为一个新因素。八月十九日,鹿传霖补授两广总督。翌日,他即以公事、病驱两难胜任奏请辞职,奉朱批“仍著振刷精神,迅速赴任,毋庸固辞”。^⑤在此背景下,曾任陕西巡抚多年的鹿传霖于八月二十八日密奏“早赴西安,建立新都,以定大计而系人心”,并条陈从潼关飞渡黄河的办法。^⑥看来鹿传霖所奏甚为称旨,清廷当日就寄谕端方督饬潼关道预备船只。与此同时,反对西幸长安者亦大有人在。闰八月初一日,包括御前大臣那彦图、载澜,以及奕劻之子载振等亲贵在内的多位臣工联衔奏请从缓西行。^⑦

毫无疑问,围绕是否继续西进,行在当局曾在太原有过激烈争论。不过,至迟到闰八月初二日,慈禧太后已下定决心西幸长安。一个明显信号就是,当日任命熟悉关中情形、力主建都西安的鹿传霖为军机大臣。要知道,十二天之前,硃批谕旨还催其迅赴两广总督之任。^⑧

- ① 崧蕃在奏折中一再强调陕甘总督此时的两大责任:保护行在后路和筹兵筹饷。《陕甘总督崧蕃奏报到任接印日期谢恩折》(光绪二十七年二月三十日)、《陕甘总督崧蕃奏请催解晋川欠解协饷折》(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三日),故宫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14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74年版,第53、77页。
- ② 《寄谕署理陕西巡抚端方著于西安酌备驻蹕之所飭地方官从俭筹备沿途踈路事宜》(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7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页。
- ③ 王彦威《西巡大事记》,李育民等点校《清季外交史料》第9册,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667—4668页。
- ④ 王彦威《西巡大事记》,李育民等点校《清季外交史料》第9册,第4674、4680、4691—4692、4703页。
- ⑤ 《两广总督鹿传霖请另简贤员治理两广片》(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日),故宫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13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74年版,第658—659页。
- ⑥ 《新授两广总督鹿传霖奏请于西安建新都折》(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八日),《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7册,第169—172页。
- ⑦ 《御前大臣那彦图等奏陈和议未定吁恳圣驾暂缓西幸折》(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一日),《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7册,第186—188页。
- ⑧ 一般称庚子年鹿传霖因荣禄保荐而入直军机处,还可再思。尽管荣禄和鹿传霖关系密切,而且戊戌年荣禄确曾保举鹿氏(马忠文《荣禄与晚清政局》,第185页),但此时荣禄尚未到行在,故鹿传霖得入军机,主要是因为慈禧太后决定继续西巡,所以熟悉关中情形、力主建都西安的鹿传霖受到重用。

朝廷西巡长安和新任两广总督鹿传霖入军机的决定,立即搅动着陕甘地区的人事变动。闰八月初三日,清廷调陶模为两广总督,署理陕甘总督的魏光焘得以实授。同时,受两宫信任、正督办前路粮台的甘肃布政使岑春煊补授陕西巡抚,旗人升允则升任甘肃布政使(随后与山西布政使李廷箫互调)。在西巡长安之前,陕甘地区的高层人事暂时安排妥当。闰八月初八日,两宫从太原启跸,至九月初四日抵达西安。

然而,驻跸西安后不久,十月十四日清廷突然下令:陕甘总督魏光焘和云贵总督崧蕃互调。魏光焘随左宗棠平定西北,在陕甘历任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和总督数十年,威望素著,措置颇当。崧蕃则从来没有任职西北的经历。那么,在当时的乱局中,清廷为何要调走一个熟手,却调来一个生手,并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

首先,这源于魏光焘在“庚子勤王”中出力不够。据岑春煊自述,当听闻八国联军进攻天津、京师危急之时,身为甘肃布政使的他向魏光焘提议,愿意立即“率兵星夜勤王”,而魏氏颇有保留,以“饷绌兵单为辞”。^①岑春煊后来护驾西行,时常召对,倘若问及甘肃情形,即使无意中略有表露,都会令慈禧太后对魏光焘产生不满。而实际上,当五月二十五日宣战后,朝廷即寄谕魏光焘,飭令回民大将“马安良迅速挑选步队六营、马队两营,星夜兼程来京”,饷械如有不足,即由魏氏设法筹给。^②然而,魏光焘却以钤制弹压地方为由,奏留马安良。^③在朝廷一再坚持后,魏光焘又以“购马甚难”上闻。^④迨朝廷又令陕西固原提督邓增募兵驰援,魏光焘即奏请邓增威望将略更好,意欲留马安良一军在甘。^⑤后来清廷寄谕魏光焘,称马安良一军“实属延缓”,不满之意已甚明显。^⑥此外,魏光焘还以甘肃财力不济为由,拒绝承担董福祥新募六营的饷项。^⑦虽然魏光焘所言或许也是甘肃实情,但在最高层看来,魏氏在关键时期的勤王表现,显然难以令人满意。魏光焘上述种种言行,很容易让慈禧太后联想到他的湖南同乡、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人正在进行的东南互保。确实,魏光焘不仅与刘坤一等湘系督抚联系密切,参与刘坤一领衔发起的奏请“收回幸陕成命”行动^⑧,而且还会同甘肃新疆巡抚饶应祺、伊犁将军长庚和俄国人搞了一个类似东南互保的“西北互保”。^⑨

其次,这与处置董福祥问题密切相关。当时,列强以惩办祸首为议和开始的前提,而董福祥尤为外人所指目。北京的议和全权大臣和东南督抚因此不断要求惩处董福祥。就在闰八月中旬,刘坤一、张

① 岑春煊《乐斋漫笔》,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2页。

② 《寄谕署陕甘总督魏光焘著令马安良率马步八营兼程来京》(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1册,第197页。

③ 《署理陕甘总督魏光焘奏陈甘肃派员带队入卫及起程日期折》(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二日),《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1册,第384—387页。

④ 《署理陕甘总督魏光焘奏报遵旨飭马安良招募回队入卫折》(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2册,第812—813页。

⑤ 《魏光焘为甘肃地方兵单请于马邓二员中酌留一员镇定并如何办理饷银事致行在军机处电》(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二日),《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3册,第992—993页。

⑥ 《寄谕署理陕甘总督魏光焘著令马安良及提督邓增统带所部一并速催趲程前赴行在》(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八日),《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7册,第163页。

⑦ 王彦威《西巡大事记》,李育民等点校《清季外交史料》第9册,第4660页。

⑧ 《两江总督刘坤一等奏请明旨回京而安大局折》(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十七日),《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7册,第233页。

⑨ 李细珠《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晚清权力格局再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388页。章成《庚子年间伊犁地区中俄交涉事件考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第114—118页。

之洞等人发起联衔“劾董”行动, 陕甘总督魏光焘赫然在列。^① 然而, 行在朝廷正依靠董福祥的甘军护卫, 为防肘腋之患, 即使处分了载漪等亲贵, 也将董氏排除在外。迨至十月十二日, 经荣禄等人反复斡旋, 甚至光绪皇帝硃谕劝慰, 清廷和董福祥终于达成了“屈己以应变、降志以待时”的“妥协”。于是明发上谕, 将董福祥革职留任, 令其带领亲兵数营趲日驰回甘肃。^② 值得注意的是, 魏光焘和崧蕃互调的命令, 恰好就在董福祥革职留任的两天之后, 显示二者之间颇有微妙关系。^③

此时, 清廷费尽心思将董福祥调离行在, 但仍面临棘手的善后难题。慈禧太后和荣禄当时主要想用怀柔手法“和平”解决董福祥。但魏光焘不仅参与了“劾董”行动, 而且还密奏董福祥、马安良所部大量溃勇为患情形^④ 与董福祥已颇水火。因此, 如果魏光焘仍任陕甘总督, 接下来与董福祥打交道就颇有不便。1902年, 《字林周刊》评论直言: 魏光焘从来都不是董福祥的朋友, 1901年朝廷之所以从陕甘总督任上调魏光焘去做云贵总督, 就是担心在他的治下, 董福祥会不那么舒服。^⑤ 另一则评论则说, 1901年魏光焘调任云贵总督, 南下带走大量湘军, 就是为了避开董福祥及其甘军, 因为双方在镇压河湟起义时有过流血冲突。^⑥

最后, 在庚子事变的乱局中, 慈禧太后更信任旗人, 故庚子、辛丑之际, 陕西(端方、岑春煊、升允)及其邻省山西(锡良、岑春煊)、河南(裕长、于荫霖、松寿)、四川(奎俊)几乎皆由旗人主政, 故甘肃后路若由旗人坐镇, 就再好不过。举目四望, 崧蕃虽无西北任职经历, 但在当时的满人督抚中资历最深, 经验最富, 又擅筹饷, 还未参与“劾董”行动。所以, 由他坐镇行在后路, 同时解决董福祥的善后问题, 当更为有利。以故, 崧蕃成为陕甘总督的合适人选。

当然, 从庚子年崧蕃的行踪看, 由他接任陕甘总督, 当是慈禧太后决心西幸长安后的临时决定。崧蕃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九月奏请陛见, 直到庚子年四月下旬方才抵京。^⑦ 此时, 义和团运动已经风起云涌。一个月后, 清廷向列强同时宣战。迨至七月初八日, 天津已沦陷, 京师乱作一团。这时, 本该回任的崧蕃奉命暂时留京效力, 会同庄亲王载勋等办理城防事宜。^⑧ 七月二十一日, 京师城破, 两宫仓促西逃。崧蕃是否当即随扈, 尚难确定。不过, 至迟到两宫驻蹕太原之时, 崧蕃已赶赴行在, 面奉谕旨回云

① 《会衔电奏》(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十日亥刻发) 苑书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3卷, 第2169—2170页; 《端抚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十三日卯刻到) 《张之洞全集》第10卷,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第8322页。

② 戴海斌《辛丑条约议定过程中的一个关节问题——从“惩董”交涉看清政府内部多种力量的互动》,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第12—15页。

③ 当时传言, 魏光焘因为“素与董福祥不协”, 又部下二万名兵士勇悍善战。“朝廷因既令董福祥回驻甘肃”, 故调魏光焘前往云南。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1册,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第228页。赵维玺已引用此条, 认为“这一说法究竟有无根据, 尚须其他资料加以印证”。赵维玺《从边吏到疆臣: 魏光焘评传》,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 第158—159页。

④ 王彦威《西巡大事记》, 李育民等点校《清季外交史料》第9册, 第4701页。

⑤ *The Viceroyalty of the Liangkang*,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Dec. 10, 1902, p. 1215.

⑥ *The Successor to the Liangkang Viceroyalty*,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Oct. 15, 1902, p. 797. 鲍威尔已论及魏光焘湘军和董福祥甘军的冲突问题: “在甘肃, 魏军中的湖南人和甘肃提督董福祥的士兵冲突得如此激烈, 以致不得不把他们隔离, 分调到甘肃省的两端。”鲍威尔《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 陈泽宪、陈霞飞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第73页。

⑦ 《云贵总督崧蕃奏为假满恳请销假陛见折》(光绪二十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13辑, 第245—247页; 《云贵总督崧蕃奏请准暂行留京报效折》(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八日), 《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2册, 第712页。

⑧ 《谕内阁著云贵总督崧蕃暂行留京会同载勋等办理城守事宜》(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八日), 《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2册, 第713页。

贵总督本任。^①可见,至少当时还并未考虑由其接替陕甘总督。迨奉到调补陕甘总督的新命,崧蕃已行抵湖南常德,遂再折回,至辛丑年正月十八日行抵西安,蒙召见两次,即于二十八日陛辞起程,二月二十四日抵达兰州,二十八日接印任事。^②

进言之,崧蕃之出任陕甘总督,虽由慈禧太后决定,但荣禄的作用值得揣摩。当时董福祥善后问题极为敏感,而荣禄与董福祥的关系甚为暧昧,所以主持行在军机处的荣禄不能不就此下一番功夫。巧合的是,荣禄与崧蕃为瓜尔佳氏同宗,荣禄亲口承认崧蕃是其亲戚。^③从下文看,崧蕃为妥善处理董福祥问题,与其“二哥”荣禄密电、密信频通,花费了大量心血。由此或许也可窥测荣禄力推崧蕃出任陕甘总督的内情。

三、崧蕃与董福祥的善后难题

崧蕃上任伊始,毫无班底,遂采用依靠旧人的办法。长期在西北任职的甘肃布政使何福堃和按察使潘效苏,成为他的左臂右膀。一年之后,当潘效苏升任新疆布政使进京陛见前,崧蕃致信荣禄,颇为其揄扬。他称潘效苏“人极朴实”,出自左宗棠幕中,“营务尤为熟习”,又谓在甘肃“资其臂助……亦可交之友也”。^④同时,崧蕃专折奏留长期追随陶模的新任喀什噶尔提督焦大聚,令其署理董福祥革职后的遗缺甘肃提督。^⑤

如果说任用旧人正是为了维护西北稳定,那么回銮之后裁撤大量甘军,就是对稳定的一个挑战。辛丑年九月,刚刚离开陕西的两宫,就以库款支绌为由,命崧蕃督同统兵将领将甘军二十二营旗裁并大半,统留八营,其中驻甘十四营裁九留五,驻陕八营裁五留三。^⑥十一月初六日,崧蕃奏称,驻陕甘军已令西宁镇总兵张行志遣散五营,酌留三营,仍驻陕西。驻甘十四营中,总兵何得彪所统四营全撤,河南南阳镇总兵姚旺的四营酌留马、步各一营,“董福祥自统六营”,陆续裁并成三营,“合之姚旺两营,以符驻甘五营之数”。同时透露,因董福祥咨称修墓,已委任该军营务处道员王世相暂代。^⑦

自然,裁撤董福祥军队的复杂性,远非奏折中那么轻描淡写。崧蕃虽然奏明令王世相接管,实则仍由董福祥“暗中照料”,因为董氏“亦知忧谗畏讥,人言可畏,而饷章报销一切,有非他人所能代理者,故裁并甘军及收缴军装,均由其妥为料理”。^⑧显然,崧蕃采用的仍是怀柔之法,对董福祥本人也拟宽大处理。

然而,就在两宫回銮到直隶正定,准备坐火车回京的前夕,形势陡然发生了变化。十一月二十三日,清廷密令崧蕃设法提禁董福祥。荣禄当日便先由密电知会崧蕃。三天后,崧蕃在给荣禄的密信中透露了重要内情:

正在缮函,于念三夕接奉略电,示及有命将草头(董福祥)提禁等语。嗣又奉枢复(军机处复信),系密寄,须设法妥办。昨已因另有要件,函请到省,只要枢中(军机处)无先露者,伊(董福祥)必肯来。此事若以永远二字了结,方对得他过(所虑者,伊部下浑人太多,难免不借端生事。尽心力为之而已——原注)。特未知是否外人又申前议?

① 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第1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606页。

② 《崧蕃电》(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八日缮递),《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4册,第1336页;《陕甘总督崧蕃奏报到任接印日期谢恩折》(光绪二十七年二月三十日),《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14辑,第53页。

③ 《欧阳熙致李盛铎函》(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十三日),邓之诚著、栾保群校点《骨董琐记全编》下册,第730页。

④ 《崧蕃札》(光绪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九日),杜春和等编《荣禄存札》,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280页。

⑤ 《陕甘总督崧蕃附请提督焦大聚暂留甘片》(光绪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14辑,第88-89页。

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7册,第96页。

⑦ 《陕甘总督崧蕃奏陈遵裁甘军统留八营折》(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初六日),《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14册,第523-524页。

⑧ 《崧蕃札》(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十五日),杜春和等编《荣禄存札》,第281页。

抑全权等预为地步? 无论如何, 总宜为之争论, 否则嗣后何以策励将才, 以后断无人效命也。^①

可知, 崧蕃的意见和措置有二, 第一, 执行上谕, 以商议要件为由, “函请”董福祥来兰州, 趁机加以软禁。第二, 崧蕃意识到, 董福祥此次一旦被拿, 很可能被处以极刑。他认为, 如果能做到像载漪和载澜那样, 定斩监候, 特予加恩发往新疆, 永远监禁, 保住性命, 方对得起董氏。^② 为此, 无论如何都要为董福祥争论申辩, 否则人心尽失, 嗣后朝廷不仅无法策励将才, 也断无人再肯效命了。况且, 即使永远监禁, 也很可能导致董福祥部下借端生事, 颇有可虑。此外, 崧蕃特别关心此次密令到底是来自外人的压力, 还是议和全权等高层预为地步, 为此特向荣禄询问。^③

现从切实证据看, 此次密令虽与外人不无关系, 但其原动力实来自新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早在庚子年秋冬, 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盛宣怀等人就在串联参劾董福祥。当时袁世凯草拟了一份劾董奏稿, 后因董福祥革职留任, 驰回甘肃, 形势变化, 暂未上奏。迨辛丑年十一月十六日, 两宫驻蹕直隶顺德府, 袁世凯迎銮至此, 随后护驾北上。^④ 在十九日致张之洞和刘坤一的电报中, 袁世凯称他连日获得慈禧太后召见, 遂以外人必欲拿办董福祥, 否则回京后徒生枝节为由, 反复陈奏。慈禧太后为所动, “但稍有难处”。袁世凯退后, 与荣禄商酌。荣禄认为, 仍须先由刘坤一、张之洞和袁世凯“举发”, 朝廷才好令出有名。袁世凯于是决定按照庚子年前议, “联疏劾董”。其疏稿即由庚子年旧稿延续而来, 疏尾云: “董福祥误国殃民, 罪大恶极, 不但为中外人心所共愤, 亦应为社稷神灵所不容, 死有余辜, 法无可贷。合无仰恳宸衷独断, 密饬陕甘督臣崧蕃, 迅将董福祥设法拿办, 俾祸首罪魁, 不得侥幸漏网, 庶四方万国, 益钦服我圣朝之至公至明矣。”^⑤可以说, 这篇措辞激烈的劾奏将庚子事变的万恶皆归于董福祥, 必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已。

张之洞接到袁世凯电报后, 当日即复, 完全赞同, 请袁速发。刘坤一则更为慎重, 他在复张之洞的电报中说: “董罪恶滔天, 朝廷詎不知之? 迟疑不决者, 虑有变耳。董在甘能否号召回部, 弟未深知。”接着又说: “果不足虑, 即可会奏, 并拟将‘设法拿办’, ‘办’字改为‘获’字, 下添‘立即正法’四字。既办即须从速, 毓贤临刑, 几被回劫, 董与回亲, 更宜慎密。”这充分显示湘军领袖更为手辣。同日, 张之洞复电袁世凯和刘坤一, 认为可以无虑, 同时建议由崧蕃派潘效苏带兵驰赴宁夏, “将董宣旨擒拿”, 然后迅速正法。张之洞特别提示, “朝廷此举本意在令各国解疑释憾”, 但明发上谕“既有不便”, 密谕则“外人不知”。故建议寄谕发出后, 由袁世凯录副“密示”各国使臣, 并嘱勿洩。由于各国使臣极厌恶董福祥, 故必不肯泄露, “而其心已悦服矣”。为此, 袁世凯特意与军机大臣荣禄、鹿传霖详细商议。结果, 荣、鹿二人均认为“一气办结(即处死董福祥), 恐其作乱, 先戕在甘各教士”, 故计划“分两截办”。所以, 二十三日早上, 袁、刘、张三督联衔劾董密奏, 奉旨留中。同时, 就有了上引饬令崧蕃将董福祥诱至省城兰州, “先拿禁”的密谕。^⑥

据前引崧蕃致荣禄密信可知, 荣禄当日就先通过密电向崧蕃透露了内情。随后崧蕃奉到密谕, 向荣禄请示办法, 露出为难之情。荣禄即表示“诚宜缓办”。董福祥或许也听到了风声而早有防备, 并未进

① 《崧蕃札》(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廿六日) 杜春和等编《荣禄存札》, 第280页。

② 此处“永远”似当作永远监禁解。

③ 薛正昌先生称荣禄保护董福祥无疑是正确的, 但谓崧蕃数次上折荣禄, 想置董福祥于死地, 恐怕有所误解。薛正昌《董福祥传》, 第318页。

④ 吴永口述、刘治襄笔记《庚子西狩丛谈》, 北京: 中华书局2009年版, 第150页。

⑤ 《致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电》(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0卷,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第60—61页。

⑥ 《湖广总督张之洞来电并致两江总督刘坤一》(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九日)、《两江总督刘坤一一致湖广总督张之洞电》(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日)、《湖广总督张之洞来电并致两江总督刘坤一》(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日)、《致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电》(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0卷, 第62、64页。

兰州省城。所以,朝廷拿禁董福祥的密谕竟一直封存,无从宣示。^①密谕拿禁董福祥事件,在荣禄和崧蕃的运作下,算是作了冷处理。

一个多月后的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月十五日,一份由陕甘总督崧蕃和陕西巡抚升允联衔的密电摆到了御前。文曰“董革提(革职提督董福祥)惜命畏诛,风声甚恶。函请赴兰议事,抗不肯来。此人罔知大义,激之必变,悍徒利器,尽在其手。万一有事,群回趁衅而起,害不胜言。邓(增)军现奉部文遣撤,若董拥多兵,而邓单骑回任,情实可虑。拟请暂留邓军三数月,俾董有所惧而不敢动,俟董营撤尽,再散邓军。此数月之饷,由秦筹拨,以顾大局。蕃等电商,意见相同。”^②当日奉旨“该督抚等务当镇静,切勿张惶,免致谣传生疑,激成事变。邓军暂缓遣撤,准照办。”^③

然而,从崧蕃致荣禄的密信可知,这是一份未经崧蕃同意,发电后才知照的电奏。崧蕃对升允的做法极为不满。他说升允“事前并不电商,亦不详询此间确情,率尔入告,始行知照电稿。以臆见谣传上烦宸廑,已为臣心所不安”,其实不过为邓增“借端少遣散数营之私计”,遂使崧蕃的“数月余水磨功夫、种种委曲求全之苦心,一旦令彼皆视为尔诈我虞之具,前功尽弃,殊属不值”,结果“目下又须另起炉灶,苦费经营,究不如前此之猜嫌尽泯也”。^④表面看,崧蕃之所以批评升允,是因为升允的行为破坏了他和董福祥一年来勉强建立的互信关系,使前功尽弃,此后斡旋难度更大;而实际上,这反映了崧蕃与升允在处理董福祥善后问题上宽严不同的分歧。

进言之,在处理董福祥善后问题上,清朝高层大致分为两派。其中,袁世凯、刘坤一和张之洞希望严办。究其原因,固然由于董福祥带兵颇多可议之处,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和董福祥在庚子事变中属于完全不同的阵营,政见极为相反,故力主严惩董福祥。如此不仅可以取悦外人,而且能够再次强调东南互保的正确性,进而增强其在回銮后决策中的影响力。袁世凯之所以在辛丑年十一月旧事重提,上下左右多方联络,必欲置董福祥于死地,除上述原因外,还有将甘军的影响力压至最低,从而用他主导的新建陆军彻底取代旧军的考量。^⑤

不过,荣禄、鹿传霖、崧蕃等人倾向缓办,希望董福祥“软着陆”。^⑥这是因为,荣禄与董福祥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崧蕃则要对陕甘地区的稳定大局负责。而董福祥在西北地区的影响力之大,前西安将军荣禄、前陕西巡抚鹿传霖和现任陕甘总督崧蕃都有更为切身的体会。^⑦这是未曾在陕甘地区任职的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东南督抚所不易想象的。此外,面对列强不断欺凌的局势,站在为朝廷策励将才、争取民心的角度,也有理由保全董福祥。所以,他们更倾向用怀柔之法处理董福祥问题。尽管袁世凯等人可以借外力要求严办董福祥,但具体实施起来,却不可能绕开陕甘总督崧蕃。故当荣禄和崧蕃暗中抵制之后,时过境迁,董福祥的问题也就不了了之。

但必须指出的是,陕甘总督从湘系大将魏光焘突然过渡到满人崧蕃,一批湘军随魏光焘调离西北,

① 《崧蕃致荣禄》(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十五日),《荣禄档·六》,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1辑第69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第85页。按,此段密信内容,《荣禄存札》整理本未收。几个月后,崧蕃仍请示荣禄如何处理密谕。《崧蕃札》(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十三日)杜春和等编《荣禄存札》,第282页。

② 《收陕甘总督、陕西巡抚电》(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四日),《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第27册,第245页。

③ 《代军机处发陕甘总督、陕西巡抚电》(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五日),《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第25册,第443页。

④ 《崧蕃札》(光绪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九日)杜春和等编《荣禄存札》,第280页。

⑤ 早在两宫驻蹕开封之时,袁世凯就以外人反对为由,试图阻止护驾的甘军北上。他说“各国深恨甘军,目为董(福祥)党。邓(增)、马(安良)两军不宜北来,启人猜防。”(《致行在军机处电》,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初一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0卷,第51页)后来,邓增、马安良、马福祥等在直隶正定陛辞请训,率领甘军返回西北。

⑥ 荣禄和董福祥的密切关系及荣禄倾向于保全董福祥,参见薛正昌《董福祥传》,第305—315页。

⑦ 鹿传霖和董福祥亦有私交。戊戌年,鹿传霖之子曾在董福祥麾下做事。参见《鹿传霖任川督时函札》(原档题名如此,与内容有所出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档案馆藏,甲170。

以及对董福祥本人宽大处理并保留其麾下部分甘军,意味着陕甘地区湘系式微、满回增强、土客易位的权势转移,正随着庚子西巡的政情剧变而悄然发生。迨1905年甘肃新疆巡抚、湘人潘效苏获罪被放军台,标志着湘系在西北地区的最终没落。这与1905年东南地区的湘系督抚魏光燾、夏崧和聂缉槩先后被罢及东南地区湘军的衰落,正好遥为呼应。这一权势转移的持续影响,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进程中清楚地显现了出来。

The Manchu Provincial Magnate Song Fan and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Shaanxi-Gansu Provinces Before and After Empress Dowager Cixi's Western Tour in 1900

Han Ce

(*Department of Histor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Xi'an (西安) became the "second capital" after Empress Dowager Cixi (慈禧太后), Emperor Guangxu (光绪) and the whole imperial court fled from Peking and evacuated to Xi'an because the Eight-Power Allied Forces invaded Peking from 1900 to 1901. As a result, Xi'an's status immediately became prominent, and the Governor-general of Shaanxi and Gansu Provinces (陕甘总督) and the Provincial Governor of Shaanxi (陕西巡抚) became more importan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it was quite unusual that the position of the Governor-General of Shaanxi and Gansu Provinces suddenly transferred from Wei Guangtao (魏光燾), a general of the Hunan Army (湘军), to a Manchu official named Song Fan (崧蕃), in 1900. This was not only related to Wei Guangtao's inefficiency to serve the imperial court, but also was a clear manifestation of Empress Dowager Cixi's deeper trust in Manchu bannermen (满洲旗人) at that time. Moreover, it was closely related to Dong Fuxiang's (董福祥) complex and sensitive aftermath issue. The case concerning "the punishment of Dong Fuxiang" in 1900 proved relatively clear. However, the story of "the re-punishment of Dong Fuxiang" was still full of mysteries in the process of Empress Dowager Cixi's return to Peking in 1901. Song Fan, Rong Lu (荣禄) who was the former Provincial Magnate of Northwestern China (西北大员) and the current Grand Minister of State (军机大臣), and Lu Chuanlin (鹿传霖) advocated giving Dong Fuxiang a soft landing, while such governors-general and provincial governors of Southeastern China as Yuan Shikai (袁世凯), Liu Kunyi (刘坤一), and Zhang Zhidong (张之洞), insisted on giving Dong Fuxiang capital punishment. All parties involved had secret operations around this case. This paper thus shows that the personnel changes of the Governor-general of Shaanxi and Gansu Provinces in 1900 and the solutions of Dong Fuxiang's problem predicted that the power transfer and the political mutation shown in the rise of the Manchus and the Muslims and the fall of the Hunan faction (湘系), were quietly taking place in Shaanxi and Gansu Provinces.

Key words: the Incident in 1900 (庚子事变), Governor-general of Shaanxi and Gansu Provinces (陕甘总督), Empress Dowager Cixi (慈禧太后), Dong Fuxiang (董福祥), Rong Lu (荣禄), Yuan Shikai (袁世凯)

(责任编辑 管 琴)